

〔美〕威拉·凯瑟
董衡巽等 译

一个迷途的女人



一个迷途的女人

〔美〕威拉·凯瑟
董衡巽等 译

漓江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
一个迷途的女人

〔美〕惠拉·凯瑟
董衡巽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2.875 插页2 字数229,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5,400册

书号：10256·160 定价：2.10元

译 本 前 言

董 衡 巽

威拉·凯瑟 (Willa Cather, 1873—1947) 是美国现代女作家。关于她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已故的爱·基·勃朗 (E·K·Brown) 教授、《威拉·凯瑟评传》的作者是这样加以概括的：“威拉·凯瑟没有巴尔扎克式、狄更斯式或者詹姆斯^①式小说家这样广阔的想象力，也缺乏那种刻意虚构全景的才能。她有意要写那种‘不带家具的’小说，与前她不久的作家相比，她的房间简直是空空如也。她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编造紧张复杂的情节。她也不是擅长写‘爱情故事’的作家；通常文学意义上的所谓爱情故事确实很少在她作品中出现。严格地说，这一些并不能说明一位艺术家的局限，只是清楚地表明她不是那一路作家而已。她专门描述那些力图掌握自己环境的人们，写农民，写传教士，写

① 指美国心理分析小说家亨利·詹姆斯。

殖民者，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写艺术家（主要是歌唱家），写他们在这个逃亡者的世界上，在紧张的现代生活中间，如何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她作品中的激情是为生活而发，为征服环境而发，为维护现状而发；她作品中深度来自她对自己创造的人物的感情。”

这一段论述对于威拉·凯瑟的特点说得很是中肯。从美国现代文学的角度看，威拉·凯瑟的贡献虽然不及福克纳或海明威，然而她是头一个着力描写“拓荒时代”的作家，她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心灵美和精神美，舒缓、纯真而又清新的风格，以及不断散发出来的清晨似的抒情气息，都独具一格，不是别的作家所能取代的。

威拉·凯瑟生于弗吉尼亚州，幼时随家迁往刚刚开发的内布拉斯加州，十七岁离家上大学，此后一直在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当杂志编辑，或者教书。由于她对舞台艺术的兴趣，她结识了许多演员和歌唱家，她早期的作品，都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描写这些艺术家^①。这些作品一个总的主题是艺术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包括艺术家如何不顾世俗的成见保持自己的人格，如何蔑视轻易可得的名声追求更高的目标，本书所选的《一位雕塑家的葬礼》

^① 主要的作品都由作者收集在《特罗尔花园》（1905）和《青春与聪明的美杜莎》（1920）两个短篇集子里。

(A Sculptor's Funeral) 就融合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她也表现了伟大艺术的力量对一些敏感的听众所引起的心灵上的变化。这些作品有的写得很细致，心理变化幽微，富于暗示，留下了亨利·詹姆斯的痕迹。但是，凯瑟在这方面的生活基础并不深厚，写多了未免枯竭。用萨拉·俄恩·裘威特批评她的话说：“内心深度不足”，“才能还没有成熟”。

裘威特擅长描写新英格兰的乡镇生活，风格含蓄精细，是当时第一流的“乡土文学”作家，深为威拉·凯瑟所钦佩。裘威特十分看重凯瑟的个性和才能。她在1908年一封信中建议她“放弃编辑工作”，“找一个安静的去处”，“必须发现自己安稳的生活中心”是什么，回想一下自己“反复酝酿多年、最后能够精确地表现在纸上的东西”是什么，因为这类题材既经反复思考，那么“不论是大是小，写下来便属于文学”。这位老作家的忠告及时地启发了凯瑟，并对她的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她果真放弃当时全国有名的纽约《麦克鲁尔》杂志主编的工作，致力于寻找“自己安稳的生活中心”，为“精确地表现在纸上”而努力。

威拉·凯瑟“酝酿多年”的题材是什么呢？是哪一个时期的生活经验给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从来没有想到要把它们“表现在纸上”呢？

她回忆起她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内布拉斯加州红

云地区那段生活。当时她走遍乡间，是多么欣赏那些来自瑞典、丹麦和德国移民的生活习俗，尤其是那些波希米亚妇女，她们是多么朝气蓬勃，多么坚毅勇敢。她回忆起居住在红云镇上那些开发过西部的老一辈人，她曾经怀着多大的兴趣倾听他们征服高山平原的故事，多么尊重他们稳重仁慈的长者风度。

从1912年起，她开始描写这些移民和拓荒者，那时她已经三十五岁。此后的十五年间，她创作了：《我的安东尼》（1918）、《一个迷途的女人》（1923）、《教授的住宅》（1925）和《总主教之死》（1927）等长篇小说。这是她创作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1931年，她在《我早期的小说》一文中回忆她在处理熟悉的题材和不熟悉的题材时所感到的“完全不同的过程”。她说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时“不必安排，也不用‘编造’，一切都很自然，褒的、贬的，自会各就各位，好比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你很想骑马，就骑上一匹熟路的马，在你熟知的乡间奔驰”。而写不熟悉的东西时，“就象在公园里骑马，与你同往的人，你不完全相投，可又老得同他攀谈。”经历过创作甘苦的人，大概会有所同感吧。

《我的安东尼》一般认为是她的代表作。小说以欣喜的笔调描写安东尼，一位从欧洲迁移来的波希米亚姑娘的成长。作者用对比的手法刻画这个人

物。那些自恃优越的美国姑娘虽然受过严格教育，却是严肃呆板，缺乏安东尼那种欣欣向荣的朝气，那种坚韧的内在力量。镇上许多青年男女都外出“寻找机会”，但安东尼坚持呆在乡间，她的丈夫也是北欧移民，他们生了许多孩子，个个身心健康，农场繁荣，同大城市生活相比，物质生活固然粗陋，精神却是“富有”，而那些外出的人虽然“变阔了”，但有的婚姻破裂，有的没有子息，也有的孤独终生。小说结束时，头发已经灰白的安东尼“仍然处于她个性最富于精力的时期”。

这部小说的写法是插曲式的，用叙述者一组组零散的回忆把故事串联起来。这些插曲象是随意悬挂在画廊上的画片，但仔细一看，它们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可以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画面的前景是一个富于朝气的农村劳动妇女，远景是正在开发之中的内布拉斯加州辽阔的原野，中间点缀着各色人物，他们用不同的神情凝视着这一片处女地。安东尼的形象占据画面的中心，她那热切、期待的目光代表着未来，健壮丰满的身躯充满了活力，标志着对未来的乐观和信心。威拉·凯瑟用明朗的色彩、象征化的形象表明：西部的物质文明是依靠这样的精神美创建起来的。把这个已经成为历史的时代再现出来，不是能勾起人们的美好回忆吗？

《一个迷途的女人》(A Lost Lady)篇幅较短，是作者所追求的所谓“不带家具的”小说，

即有意淡化与人物形象无关的笔墨，摆脱铺床叠被式的逼真描写，突出意象与含义，把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压缩在一部中篇的范围之内。小说着力塑造一个美丽、聪明、迷人的年轻妇女——福瑞斯特太太。她生活在“拓荒时代”的后期，处于两股势力交锋的中心。一股是以她丈夫福瑞斯特上尉为代表的、开发过西部的老一辈人，他们不畏艰险，“用铁轮马车征服过高山平原”，但由于“心胸宽广”、“不计实利”，“难于守业”，濒于破产。另一股是年轻的一代，以新型律师艾维·彼得斯为代表，他们没有冒过风险，却坐享其成，把老一辈开辟的江山占为己有，把它分割成一宗宗有利可图的财源。福瑞斯特上尉那一辈人讲义气、讲信用，讲道德，但这些高尚的情操到了年轻人手里竟荡然无存。更有甚者，他们目中无人，不把前辈放在眼里，俨然成为西部财富的主人。

在威拉·凯瑟看来，妩媚的福瑞斯特太太应该属于“拓荒时代”，是福瑞斯特上尉救了她的命，又是福瑞斯特上尉促使她成为甜水镇上首屈一指的贵妇人。但是她生性浮华，留恋花花世界，因此等福瑞斯特上尉破产之后，她倒向“新”势力的一边。她始终没有觉悟过来：她之所以迷人，所以博得全镇上下的尊重，主要不是因为她个人有什么特殊的美德，而是由于福瑞斯特上尉的庇护，也就是说，“拓荒时代”的余辉使她发出夺目的光采。她

丈夫去世之后，“她成了一条没有镇重石的船，随不同的风向东飘西荡”，“丧失了辨别能力”，甚至以“风流寡妇”为荣。用故事叙述者尼尔的话来说，“她属于拓荒的时代，但她不愿意与这时代共存亡”。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形象，一方面描写老一辈人的晚年，从他们黄昏夕照之中捕捉过去时代的光辉，另一方面又无限惋惜这个时代的衰亡。品格高尚的创业者不能适应新的时代潮流，而象艾维·彼得斯这样没有道德但善于钻营的人却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如果说《我的安东尼》是拓荒时代的一支颂歌，那么，《一个迷途的女人》就是那个时代的挽歌了。

从《我的安东尼》到《教授的住宅》，威拉·凯瑟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由于美国社会生活的机械化与商业化，加之世风日下，威拉·凯瑟感到愤慨和悲观。《一个迷途的女人》就已经流露出惆怅甚至哀愁的情绪，《教授的住宅》的基调更是压抑和沉重。

《教授的住宅》的主人公圣·彼得教授是研究美洲早期文化的学者，他的多卷本专著《西班牙人的美洲探险史》给他带来巨额的收入，也带来生活的变化。他的妻子女儿住进了新的住宅，竭尽物质生活的享受。可是，教授不愿意离开老住宅，它虽然破旧不堪，结构不合理，但他在那里住了三十年，他辛勤劳动的汗水流在那所房子的阁楼书房

里，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在那里取得。老住宅是他精神上的家，他怎么能够抛弃呢？

这里，住宅是一种象征，象征一切旧的但是美好的事物的衰亡。小说围绕着这一点，用许多今昔对比的形象来衬托，例如，教授发现战后那一代学生都是“平庸之辈”，年轻教师“自私自利”，教学计划受制于州的立法机构，居然挂着大学的招牌，以办好商业学校为荣。这种时世“把一切青春、一切优胜之处都一扫而光”。今不如昔的情绪流动在字里行间。

本书所选的《汤姆·奥特兰的故事》(The Story of Tom Outland)就是《教授的住宅》第二部分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独立成篇，又与全书有联系。圣·彼得教授发现汤姆·奥特兰是他三十年来所遇到的最优秀的人才，可惜死于战场。奥特兰在新墨西哥州所发现的印第安部落的遗址是方山上的一座崖城。仅以建筑设计角度来讲，这个“小城紧凑，有某种构思”，着眼于群体，与圣·彼得教授所厌恶的美国现代独门独户的设计思想适成对比，汤姆·奥特兰为了促成政府对它进行考察和发掘，走访华盛顿，但等待他的是层层官僚机构，各个部门你推我卸，无人负责。院长、专家、教授个个热衷于官运仕途，没有一个真正热心于考古发掘。奥特兰等了几个月一无所获，灰心之余，“唯一渴求的仅仅是回到方山去过无拘无束的生活，呼

吸自由自在的空气。”这自然也是威拉·凯瑟的理想：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圣地”上，古代的印第安人“没有什么可以竞争的，除了自发的对秩序与安定的想望之外没有别的动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与心血都浇灌在这座方山上，使之赋有人类文明的痕迹。”威拉·凯瑟这一番思古之幽情是有所针砭的。比起大城市里蚂蚁般的小公务员的生活来，清静幽深的方山，不是一个纯洁的去处吗？与热衷名利的庸俗的教授学者相比，年轻无知的汤姆·奥特兰不是更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更强烈的责任感吗？这正是常为人所称道的威拉·凯瑟那种“早晨的清新气息”，使受过污染的人们精神为之一爽。

威拉·凯瑟后期的两部重要小说《总主教之死》与《岩石上的阴影》（1931）具有复杂的倾向。前者写法国神父开发美洲边远地区的活动，后者写开发加拿大的法国殖民主义者。作者写这些传教士和殖民者如何真诚地为传播文明而献身，可以看出作者的赞扬也是真诚的，这自然无助于读者建立正确的认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者主要是抒发怀古之情，她把美洲早期传教士和殖民者理想化，用抒情笔调加以渲染，反映了她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绝望。那种真诚负责的人生态度，那种坚毅、勇敢的献身精神，也就是说，她一切美好的理想，只能在一个被她理想化了的幻景中才能实现。威拉·凯瑟是一个在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创作的理想

主义者，不是一个具有先进世界观的历史学家，因此，对美洲早期的传教和殖民活动缺乏历史的、辩证的理解，原是意料中的事。

威拉·凯瑟也是写短篇的能手。她的短篇小说集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之外，还有《模糊的命运》（1926）和《老美人》（1948）。我们这里所选的作品除《一个迷途的女人》之外，都选自这些集子。

她的短篇小说以描写人物形象为中心，并通过人物形象组织情节，写得干净利索，“不带家具”，具有以一当十、小中见大的效果。

《街坊罗西基》（Neighbor Rosicky）是威拉·凯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常为各种选本所选用。小说描写一个来自捷克的波希米亚移民罗西基的晚年。他抛弃城市生活，迁居乡间。他为人慷慨、和善、热心，正因为如此，“日子永远不会好过”，但是对于罗西基夫妇来说，“宁愿孩子们脸色好看点，也不想把钱放到银行里去”，所以“生活一直是艰苦的，也是甜蜜的”，“虽然穷，但我们还是高高兴兴的。邻居们虽然心里难过，日子也没有因此就好些”。正是这种乐观、健康的精神状态，使一家人融洽无间，家庭矛盾逢刃自解。

罗西基的形象，象威拉·凯瑟笔下其他老一辈移民一样，心胸开朗，富于人情，不斤斤计较实

利。这不同于蝇营狗苟之辈，也与浑浑沌沌过日子的小市民有了区别。作者赋予罗西基的是一种豁达、广阔的精神境界。

《哈理斯老太太》(Old Mrs Harris) 中的同名主人公随一家人从南部迁居西部，小说写的也是她的晚年。她作为长者对家人的关怀与操心不下于罗西基。对于她来说，“撇开全家的舒适，叫她独自享受”，“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不同的是，她的家庭问题众多，包括女儿常常不称心，经济拮据，子女过多等等。更严重的是一家人各有各的打算，人心不齐。哈理斯老太太处于管家但并不当家的地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解决一些困难，而且这么做的时候，没有一点虚荣之心，并不自恃功劳，相反，她竭力把自己隐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临死之前她只求自己“不要久病”，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不用麻烦任何人”。遗憾的是，她这番苦心，并不为任性的小辈们所赏识。

《哈理斯老太太》同《街坊罗西基》一样，写的似乎都是一些生活琐事，但中心是一个为人的准则问题，一个家庭道德问题。哈理斯老太太悄悄地从生活中消失了，但她的女儿、孙女儿还有“漫长的”人生道路，她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过去太没有良心”呢？

《最美好的岁月》(The Best Years) 是威拉·凯瑟最后一个完成了的短篇。主人公弗格森太

太随着家庭经济情况的改善，于乡间迁入城镇，但是在她看来，“人们只有住在他们曾经在那里生儿育女、奋斗前进、不是作为过客而是真正当家作主的土地上才感到最大的幸福。”所以，她认为“最美好的岁月”在于“最艰苦的时候”。那时候，虽然经历了丧女之痛，“看不到出路”，但一家人亲密无间，齐心协力，“仍然勇往直前”。

小说的背景是拓荒时期的内布拉斯加州，那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构成了小说的高潮，我们看到人们在灾难中如何从容自若、勇敢坚定，无私地互相救助。作者怀着美好的理想着力表现当时美国劳动人民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动人的道德力量；拓荒的一代所取得的物质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她告诉读者：离开了这种精神力量，任何物质进步都是不可想象的。

小说取名《最美好的岁月》，这是威拉·凯瑟在《我的安东尼》中引用过的一句话：“最美好的岁月……最先消逝”，反映了作者晚年对那个“创造性的英雄时代”的深深怀念。

威拉·凯瑟作为一个艺术家，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尤其是党派斗争始终抱着厌恶的态度。《两个朋友》(Two Friends)就揭露党派斗争怎样损害狄龙与特鲁门两位老朋友之间的友谊。原先，“两人都乐于听到各自的党派受到嘲笑”，“好象那种取笑是一种恭维似的”，但从狄龙参加一次民

主党大会，受到“自由铸造银币”宣传蛊惑之后，热衷于政治宣传，“身上多了一点俗气，少了一点自己的独特品质”，以致老友之间反目，弄得“事事乱了套”，“心灵的平衡”“毁于一旦”。作者通过一个女孩的眼睛展示这场冲突，在这个孩子的心灵上刻下深深的伤痕。在她看来，友谊是极珍贵的，现在只有老一辈人中间才有这份财富，但包括党派斗争在内的污浊的世风破坏了人类的“珍品”，使她一生引为憾事。

威拉·凯瑟的短篇小说象她的长篇小说一样，贯彻着精神美和心灵美的主题。她向往一个草原辽阔、空气新鲜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积极乐观，艰苦创业，他们心地纯洁，互相帮助，沐浴着单纯而又温暖的人情。这形成了威拉·凯瑟以崇尚美德为中心的艺术境界。她作品里那种平和的理智、控制有度的激情、明朗的色彩以及诱人的清新气息既反映了作者的创作个性和艺术气质，又表现了作者理想的道德准则。

凯瑟琳·安·波特说过，威拉·凯瑟的风格不是装模作样从外面贴上去的，这是作者“向美学扩展的一种表现真情实感的道德品质，来源于艺术家的有道德的本性——不是美学观点的道德，而是二者与其它特长相结合的共同发展，直至成为天衣无缝的浑然一体，把想象和想象的表达手法融成一体。”波特也是一位讲究艺术风格的美国女作家，

创作活动略晚于凯瑟。如果波特讲这番话的时候凯瑟还在世，我想她是会引为知音的。

本书编选工作承刘婉同志协助校对译文，深表谢意。

一九八三年八月于青岛